

在民进中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许嘉璐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我首先代表民进中央欢迎各位嘉宾拨冗到会。

今天的研讨会时间虽短，但是群贤毕至，相信会议的内容一定会很丰富，大家的发言一定很精彩，一定会给人以启迪。大家准备的论文和发言，每篇都不是即兴之作，而是通过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长时间地思考与实践后凝聚而成，其中包括并提出了自己给出的答案。虽然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多年，也想和大家一样写一篇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论文，但我脱离高校的教学和领导岗位已经很久了，再加上最近很忙，所以有些力不从心。只好认真拜读各位的大作，从中吸取营养。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民进为什么要研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必要性和可能性，二者具备就要付诸实施。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要求解决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普及的问题。在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普及义

务教育的年限是不同的，比如泰国正在努力实现普六，我国则是普九，前苏联是普十，很多发达国家是普十二，还有的国家是普十五、十六。一般而言，普及的年限是随经济增长而延长的。当经济发展到多数人进入基本小康的时候，对教育需求的视线就要向上抬起，即加大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当接近全面小康的时候，视线又开始向下，即把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视线延长到幼儿教育。不久前，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幼教百年的纪念大会，大会呼吁把人才培养的视线延伸到孩子出生那一刻。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些超前。但我们不能等到实现了全面小康再提出加强幼儿教育和婴儿教育的问题，那就为时已晚了。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基本小康，就需要把视线抬高，从理论层面以及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加大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参与力度，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认为目前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数量与全民人口之比或同龄人口之比偏低，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第二，现有的教育体制没有完全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解决前一个问题，既要靠国家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同时又要调动社会资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就是全国人大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初衷。在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时候，不同思想观念的摩擦冲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年来有一种思想牢牢盘踞在社会上相当多人的脑子里，那就是把教育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必须由国家来办，国家办的自己才放心。全国人大在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过程中，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受到了这种观念影响，这个法最终是一个调和和妥协的产物——当各方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在一些非本质问题上做些调和妥协是必要的——能不能真正起到促进民办教育的作用，还要在实践中观察，拭目以待。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应该平等看待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民办教育促进法》基本上是符合这一精神的。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当二者发生矛盾，即上层建筑不能满足经济基础需要的时候，上层建筑必须变革，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最大的动力，它需要上层建筑保障它的发展。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突破和推动常常采用武装流血的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采取改革的方法。但是如果这种改革慢了，造成二者持续不相适应，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矛盾点就会转移，就可能引起造成社会动荡。例如，近几年高校扩大招生，最初赢得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包括家长、学生、学校、用人单位。但是，从去年开始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今年又有所加剧。同时很多高校由于扩招，学校的硬件软件跟不上，教师的业务水平、综合素质跟不上，教学质量也受了很大影响。再加上旧有的教学模式、教学计划没有及时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调整，因此培养出了很多拿着文凭、但并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有大批的毕业生得不到用人单位的录用。单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虽然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各省教委以及各大学的书记、校长都在努力，想把事情做好，但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虽然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几种不满意，家长省吃俭用供孩子念大学，毕业后现在却找不到工作；孩子抱着一种美丽的理想进入城市，理想却破灭了；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的人才或者是招不到人才。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逐渐缓解。当择业难的孩子逐渐增多，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矛盾点就会转移，就会造成社会问题的动荡，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动荡，都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任何社会的变革都要顺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人们的观念也属于上层建筑，也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变革。我们的高校一般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在我们的很多县城、乡镇企业中需要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要这些大学生到那里去却是很难的。因为人的通性是只能向上走，不能向下走的。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复杂，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不久前我到我国信息产业的航空母舰——华为集团去考察。华为集团有 12 000 研发人员，从大专到博士后，今年的科研投入有 40 亿。华为集团已经被欧洲、美国的同类公司视为真正的对手。华为集团招聘研发人员是不单看文凭的，博士生招录进来可能要听大专生的指挥，薪水也可能只是大专生的一半。有证书只是可以准入到考场，如何使用还要根据你的能力。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革，人只能去适应它。

这些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规模宏大、相当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机制也在变革，但是对最根本的体制触动不大。我刚刚考察了重庆大学和西南师大的校园文化建

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他们在学校的体制改革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学校及教师申报的专利很多，但真正实施的却很少。科研成果能不能实施很重要，不能实施就解决不了生产力问题。不能实施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里既有实力和政策问题，也有体制问题。高等学校就是个小社会，“校事乱如麻”，诸多问题的核心就是体制问题。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权力下放，包括人事权、财权、专业设置权等等。

中国的改革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所有改革措施的提出都不是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所提出的课题。这不同于有些国家的改革是理论推导出来的。第二，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先在小范围进行大胆的突破、实验，然后再由党中央、国务院把这种新的探索和做法提升、完善，最后推广开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十二门类四十二条，几乎每一条都有地方在试行。比如风险投资，高科技生产有一定风险，国家包办不行，以企业投入为主体又贷不了款，因此需要辅之以风险投资。现在广州市的风险投资已经达到 8 个亿，动用了 5 个亿，扶植了 100 多家企业，生产产值 100 多亿。我国的风险投资与国外的不同，国外的风险投资是我有一笔钱，你有一个想法，我认为你的想法很好，于是投资建实验室，成则赢利不成则赔本。我们是有了想法，实验室出结果了，甚至于进行了部分中试，就差车间、设备和批量生产了才去投资。我们的风险投资不仅风险没有国外的大，而且规模很小。这是在探路，在摸索，今后会慢慢完善。所以党中央的思考既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将其理性化，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地方试点的经验加以完善提高，然后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来的。

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如此。这也正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我们并不指望专家们在这里研讨一天后形成一个理念回去就付诸实践。这样也不可能成功。我们的目的是把大家的智慧汇集起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被采纳后再推行。

民进中央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高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推动。高等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行的时候，人需要全面发展，社会需要不断补充文化的内容、精神的产品，这些都来自于高校。同时高校最主要的产品是人，随着一批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各个角落，就把人类的文明、民族的文化，以及最新的知识、观点带到社会上各个角落去了。高校校园文化应该是整个社会最先进文化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说，高等学校是人类文明、民族文化遗产主渠道的龙头。尽管信息社会网络媒体很发达，但那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北京 70 多所大学，上百万学生，遍布全市，高校校园文化搞好了，北京的文化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大学怎么变，中学小学就会跟着怎么变，进而再扩展到幼儿园。我们可以看到，幼儿教育已经变了，现在注重的是培养孩子的个性、兴趣、品格、习惯，这是因为高校强调人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所以我说它是龙头。

以上我谈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作用，但是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相对滞后已经制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了。这就是民进为什么要研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原因。一句话，因为这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是党中央、国务院正在思考的问题。

至于说到研讨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简单了。一是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我们有相当丰厚的智力资源；二是我们与教育界，包括高等教育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民进之友；三是我们有超脱的身份和表达意见的畅通之道。简言之，我们有条件研讨，研讨了有用。

二、民进如何参与

简言之就是调查研究、建言献策。

首先要强调三个结合：

1.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来自于实践，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国外的实践经验。现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全世界也是热点之一。这里我要强调，我们借他山之石的时候一定是“他山之石”，而不是“一家之石”。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并没有真正全面地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因为我们更多地是向美国学习了，欧洲在我们的视野中所占甚少。美国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比如教授任职三年期间要写一本专著，这就不够合理，因为真正好的专著可能要一辈子去完成。欧洲的教育的确有很多亮点和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希望我们在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能够突破只向美国寻求依据的现状。我们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比如向理工科大学注入人文因素，对这些好的经验应该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2. 校内和社会相结合。我曾经问过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你在学校学的东西有多少是有用的，多少是没用的。他回答说，多数是没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恰恰没有学习美国的做法。美国的法律教育是案例教育，实习占课程的 1/3；实习不

是在模拟法庭进行，全部在真正的法庭。我们的法律专业理论课过多，只是象征性地到法庭、监狱去看看，所以学生的实践经验多数都是要靠工作后的积累。在我们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还要思考我们的高等教育如何面向社会：社会的现状、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

3. 政府与学校相结合。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的教育都很难办。我曾讲过：教育，人人可得而言之。因为人人都是教育的受惠者，所以人人都有发言权。但是总要有个牵头的，这就是政府。政府占有的信息资源最多。要注意和政府沟通。大家都想把工作做好，只不过站的位置不同、看法不同、实践背景不同、理论思考的程度不同。所以只有沟通，才能达成共识，才能集中大家的智慧。高教改革也是如此，高校要和教育部有关司多沟通，形成合力。比如放权的问题，自主编制专业目录的权力现在只是局限在教育部直属的几所重点大学，能不能把它下放给所有学校。教育部有教育部的考虑，又有他们的难处，我们要了解，不然提不出真正能帮上政府忙的意见。

其次是加强宣传，制造舆论。论文集常常只是给对高教改革感兴趣的少部分人看的。建议有关媒体组织专版，把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论点宣传出去。加强宣传的目的是能够引起社会的讨论和关注。后续的有关民进参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动作都要及时尽量在社会上扩大影响。

再次，通过研讨团结越来越多的会外专家，结识越来越多的民进之友。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视野，集中更多的智慧，研究更多个案的经验。国内 1000 多所大学都在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但是现在的总趋势是在趋同，比如都要办成“综合性的、科研型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大学，各校都这样就会

失去特色。今天的研讨会本身就是我们结识请教民进之友的机会，同时也是为明年规模更大的会议做准备。

我建议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给予一定关注，这也是民进明年的重点调研课题之一。从广义上说，这也需要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比如高校改革之风劲吹，体制和机制时时要做微调，必要时大调，那么学生受到的熏陶就是要与时俱进。这样当学生走向社会上，不仅对他的改革思维意识有好处，而且对他自己专业的创新也有好处。当然校园文化建设要有一些具体的抓手，比如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学校的氛围，学生对自己专业之外的接触和了解等等。校园文化是最容易形成个性的，办学的方向和内容会趋同，但是校园文化是有个性的。我们的大学既要追求共性即规律，又要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我讲的难免有不周之处，权当抛砖引玉。

(2003 年 11 月 29 日)

第一篇

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

大学之用

蒋国华

应邀参加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组织发起的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既感到高兴又觉得有一种责任。随着大学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的扩展、转折、或提升，随着政府对大学的重视、资助，和随之而至的对其要求的提高，也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变化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包括研究高教的学者在内的思想和认识的程度，于是，历史就往往扮演起一个捉弄人的家伙，它不重复，但又常常重演某些事件或现象。这就是近 10 多年来，某种意义上是世界范围内的有关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什么用的讨论乃至争论，风烟又起，且此起彼伏而又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恰恰这类争论在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克尔的名著《大学的功用》中早就有明确的记载。克尔告诉我们，在他经历的年代里，人们的大学观至少有过三次大震荡：第一次是弗莱克斯纳总结 20 世纪初期的大学变革，并于 1930 年提出了他的新的“现代大学观”；第二次是弗氏的阐述“现代大学观”一书刚出，“美国大学已经远远不同于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了”。为此，弗氏曾大为沮丧，因为在弗氏看来，简直是世道变了，现有大学越来越不象他追求的“地道的大学”了。第三次是 1970 年前后，且不说有众多的诸如《有关高等教育的教条之解体》等抨击高校变革的专著出版，就连克尔自己，当时作为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也发表了“现时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否正在逐渐衰亡”的见解。要知道，

“大学模式”“衰亡”一语，乃非同小可！细究其因，当然，还是克尔的话对，问题就出在，“历史的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快得多”。这种急速变化恰恰是“植根于历史逻辑中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归根到底，大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说是社会变革的反映。

因此，笔者以为，克尔先生的书名起得很好，叫做“*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翻译成中文，就可以叫《大学之用》。当然，该书译者高教专家陈学飞教授他们，给它取了个雅名《大学的功用》。“功用”比单独一个“用”字，显然要文气得多，但其本质涵义恐怕是一样的，是别无二致的。为此，今天，若把我们的讨论叫“大学理念”、“大学观”、“大学功用”、“大学作用”、“大学功能”、“大学何为”、……等等，都是可以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大学理念也必然是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大学的社会存在始终在历史地发生变化，反映这种历史变化的大学理念当然也必须相时而变，与时俱进。换句话说，一定的大学理念乃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其中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学的追求，大学在始终追求为了人类社会更发达、更文明而生产知识、研究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

F·培根说过：“*Scientia ipsa potestas est*”，其英文表达就是：“*Science is power*”因此，培根的名句既可译为“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也可译为“科学（知识）就是权力”。鉴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那么，以知识创新为己任的基础科学研究必将成为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产业。近一二百年的科学史、知识史、大学史和经济史告诉我们，从事这样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只能在大学里才能进行和持

续，因为它需要长期的资源和责任。显然，迄今为止的工业大约无法承担这样的基础研究的责任。

可以预料，大学，特别是位列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将在未来社会中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甚至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社会权力。

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当代社会的多元发展似乎已见共识。倘若这一点没有疑义，那末，大学及大学之用也必将是多元的。然而在这多元发展过程中，大学之领先靠什么？大学之兴衰在什么？大学之于国家兴衰最关键之点在何处？从近 10 年文献看，表面上看来这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对：“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对大学来说，无论怎么多元发展，其主要矛盾运动依然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北京大学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把前者称为“知识贡献”，将后者称为“人才支持”。根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个论断，未来大学将必须重新分类：一类是所谓名牌大学（brand-name university），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主要之用在知识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与集聚总是跟着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走的道理。另一类是所谓大众大学（mass-provider university），不论专业、学科、年限的所有高中后教育机构，和传统的所谓正规大学一起，都包括其中，其主要之用在人才支持，即培养有学识、有技能的、数量必定宏大的劳动者。顺便说一句，在作大学评价与大学排序的时候，上述两类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是不同的，对前者主要以科学指标，亦即科学计量学指标为主，旨在衡量其“知识贡献”的水平；对后者则主要以经济指标，亦即产业指标为主，旨在考

量其“人才支持”的质与量。

今天我们研讨大学理念，关键在明白大学之用。对大学自身来说，则要明白自己何以为用。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会在各国的大学之间展开；而大学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自拥有的知识资本之间的竞赛。知识资本就是知识资本，它是以知识贡献为中心的知识资源在社会诸领域的反映。在这里，任何政治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任何文字游戏式的“知识创新（系统）”，任何“回到象牙塔”的孤独呼号，都是无济于事的，需要的倒是真正能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

这就是笔者的“大学之用”观。

参考文献

- [1] 克尔. 大学的功用. 陈学飞等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 [2] 乔玉全. 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4] 冯之浚等. 现代教育.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蒋国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民进北京市委 (100020)

E-mail: ghjiang@public3. bta. net. cn

从知识经济角度审视大众化 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王贺元

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其对人类世界的影响足以和一百年前的工业革命相媲美。工业革命将人们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此走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经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知识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丝毫不逊色于工业革命，甚至还超过后者，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浪潮奔向中国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期而至。高等教育一个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能为社会所用的人才，不能做到这一点，高等教育就是一个失败的教育。对于知识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99年我国采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连续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截止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总规模突破1400万人，是1998年的近三倍。招生规模之大，所用时间之短，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招生人数的巨大增长，也必然带来高等教育学校毕业生的巨大增长，这些学生要进入市场，进入经济社会，也意味着必须接受知识经济浪潮的洗礼。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既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两大热点，引起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又是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两支重要力量，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精英教育如何定位，有必要从知识经济角度对